

当代中国大学如何安排“国学”学科?^{*}

吴根友

摘要:国学是现代中国学术对于自己民族学问之总称,主要是指四部学问或知识。由于中国传统学问是以“治道为中心”的学问,故国学的核心内容是经学。不理解经学的核心地位,就不足以理解国学内部的知识谱系。国学学问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层次——道、艺、技。从当代中国人文学的文、史、哲、艺的学科来看,国学学科实际是人文学内部的交叉学科,它不能取代,也不必取代文、史、哲、艺四大学科的各自独立性,但可以弥补四大人文学科各自的不足与缺陷。国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里,它必须与其他学科发生内在的关系,故国学教育的课程体系不必与其学科体系完全重合,这样更有利于国学专业的学生培养健全的人格。

关键词: 国学; 知识类型; 交叉学科; 课程体系

DOI: 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16

传统中国学问(知识)、典籍分类体系是“以治道为中心”的,特别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确立的原则及其内在的逻辑,都是根据学问对于治道的重要性程度的远近而予以先后秩序安排的。这一点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逻辑颇不同,与当代中国大学的学科分类原则也是不同的。当代中国大学的学问分类体系整体上是分立的、客观化的自然、社会、人文现象与事相为依据的。我们目前所讨论的“国学”虽然有自己的客观对象,即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之总和,但由于其对象范围过于庞大,其学科承载的媒介过于复杂,因而在现代学科分类的原则下其实很难给出明晰的边界。不过,国学学科内部倒可以有自己的学问分类体系,比如说,武汉大学国学院在继承传统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基础上,加上“中国宗教”一项,大体上构成了我们对于国学学科学问分类体系的一种探索性的认识。

一、建立“国学”学科的必要性 with 逻辑基础

从当前中国人文学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国学作为一级学科既有自己的现实基础,也有合乎学科发展需要的逻辑理由。具体来说,有如下四点:

第一,当代中国大学的文科教育,严重地割裂了中国传统学问(知识)固有的内在联系。中文系、历史系基本上按照自己学科的内在要求研究中国历史上属于经学内容的《诗经》《论语》《孟子》等著作。历史系则按照历史学的学科要求来研究《尚书》《春秋》及“三传”。哲学系、历史系的中国哲学、中国史专业的学生基本上都没有受到最基础的小学训练。文、史、哲三科分立的现状,严重地肢解了以“经学”为主要学问的传统学问的完整性,因而无法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要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就必须从学科建制上恢复“经学”的学科地位,从而为完整、准确地理解传统文化提供现代学术研究的基础。

第二,国学作为一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一级学科,主要要求学生在文、史、哲三方面有一个较为完

^{*} 收稿日期:2017—05—15

作者简介:吴根友,教育部长江学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 430072)。

整的素质培养,为日后的分科研究提供一个宽广的学术基础,弥补现代大学文科分科培养所造成的思想的片面性与知识结构的单一性的缺陷。

第三,国学研究与教育,可以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认同感,提供基本的伦理共识与文化共识,培养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同时为当代社会人格培养、当代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建设提供丰厚的中国文化元素与特色。

第四,为当代世界文化提供一个鲜活的文化类型。从逻辑上说,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学问(知识)体系。然而从现实性上讲,并不是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独立的、成系统的、而且延绵三千多年的学术与文化传统。美国就是一个只有现代史的民族国家,没有自己的“国学”,只有源于欧洲的古典学(古希腊与中世纪基督教的学术传统)。其他很多国家也都缺乏自己的、成系统的、延绵三千多年的学术与文化传统,如亚洲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因此,当代欧洲的一些民族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都很难说有什么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国学”,他们有的只是共享的古典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传统。

基于以上认识,当代“国学”作为一级学科的分类原则,主要是现实性的要求,而不完全是要服从现代中国按照西方知识分类的抽象逻辑,以之作为学科分类的准绳。实际上,中国当代学科的设置,如作为一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作为二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都是根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需要设置的。这正是继承了中国传统学问(知识)、典籍分类“以治道为中心”的核心精神。如果要寻找“国学”学科在知识分类上的逻辑基础,交叉知识与综合知识当是国学学科的逻辑基础。“国学”正是在人文学的几个一级学科——文、史、哲、艺之间实行小的交叉,因而也将以交叉学科的性质在现代大学的学科建制中获得自己的学科合法性地位。

二、知识的类型与国学知识的三个层次构想

现代哲学认识论非常重视事实与价值之分别,从而在事实描述与规范判断之间确立一个较为明确的分界线^①,也间接地在科学与人文学之间确立了一道明确的界线。一般而言,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是以研究事实为其主要任务的。科学的任务在于“求真”,这是现代学人的共识。科学的“求真”活动也要服从于人类的向善、致美的价值追求。在政治对人类生活有绝对影响的时代,科学的“求真”活动与政治家们的政治理想有着密切的关联。

事实与价值之分,虽然主要起源于现代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得力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突飞猛进,然而也不是在现代社会突然出现的人类精神现象。至少,就中国古代哲学而言,《易传》中“天文”与“人文”的区别,庄子哲学中的“知天”与“知人”的区别,乾嘉时代戴震的哲学思想体系里“实体实事”与“纯粹美好”两种概念的区别,都可以看作是事实与价值区分的中国式的表达。17世纪以来现代西方哲学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知识论的发达,对于知识的分类理论更是枚不胜举,如波普尔在“三个世界”理论的基础上,将知识分成两类,即主观的知识与客观的知识。所谓主观知识,即“某些认识主体所具有的知识”^②,是依赖于世界3的知识,即“依赖于语言表述的理论”^③。所谓客观知识,即是“由我们的理论、推测、猜想的逻辑内容(我们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加上我们遗传密码的逻辑内容)构成”^④。迈克尔·波兰尼则站在后批判主义的立场,对于所谓普遍的、客观的科学知识进行批判,提出了“个人的知识”新观念,将知识看成是个人的信仰、寄托有关的一种意识与认知活动,其中还包括那些无法言传的“默会的知识”(或意会的知识),从而提出了一种广义的知识论。他认为“个人知识是一种求知寄托,也正因为

① 参见孙伟平《事实与价值:休谟问题及其解决尝试》第1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③④ [英]卡尔·波普尔著、舒炜光等译《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8、79、78页。

如此,它具有内在的冒险性。只有那些有可能是虚假的肯定才能被说成是传达了这种客观知识。”^①

本文并不想对古今中外有关知识的理论做一系统的研究,而想通过这一知识分类谱系的梳理,作为我对“国学”学科分类认识的切入点,即试图从知识谱系的认知视角出发来讨论“国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当代社会成为一级学科的可能性。在前人有关知识理论的认识基础上,结合国学学科的自身特点,特别是为了服务于大学本科教育的要求,我将国学知识初步分成三个层次:一是基础理论知识,二是具体艺术知识,三是具体技术知识。依此知识谱系,我们可以将国学知识分成三个层次的内容,即国学、国艺、国技。国学着重于探讨中国传统的理论知识,这即是今天学科中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等学科要处理的问题。有关中国政治、法律、艺术中的思想史研究,都可以划入专门的思想史研究领域,如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法制思想史,中国艺术思想或中国文艺美学思想史等领域去研究。国艺着重探讨通过具体媒介表现出来的艺术性知识,如国画、书法、传统戏曲的唱腔及各种器乐等。国技主要探讨传统技艺中的术数类的知识,中医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至于占卜、堪舆、风水、相术、民间单方等民间方技,在条件适合的地方可以成立小型的研究中心。

上述三个层次的知识研究,可以引进现代西方的学术方法来加以研究,使国学知识在现代社会有一个更好的理解,并能更好地发挥国学知识的作用。比如说,中医可以吸收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特别是现代电脑技术,使传统的望闻问切的诊治手段更加精确。国画亦可以吸收现代西洋画法,使之更具有表现力;传统的唱腔可以吸收现代的声乐原理与发声原理,传统的器乐工具可以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加以改良等。因此,我们提倡将国学作为一级学科,丝毫没有拒绝现代西方学术与思想的意思,反而强调要吸收现代西方的学术与科学研究的手段去研究传统国学的学问与知识,以使之能够更好地为现代人服务。

三、学科分类与课程体系的关系

就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学科分类体系来看,其主流是依托西方的知识分类来设置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与三级学科的。不过,学科分类又不完全是按照知识分类的逻辑展开的,有些学科很难有知识分类的逻辑基础,如教育学、心理学等。如果按照事物的逻辑来对知识进行分类的话,那些分立的客观事物更容易成为知识的研究对象,如现代的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医学、农学等。随着现代社会的深度发展,学科交叉日益明显,而且越发变得需要。那些处在多学科交叉带的“关系实体”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如生物化学、物理化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环境科学、心理学等就成为新兴的学科。“国学”作为人文学内部的交叉学科地带理应成为一门新兴的人文交叉学科。这一新兴的交叉学科边界虽然不易确定,但大致的范围还是清楚的,那就是以中国古代学问(知识)(广义的)为研究对象,其依托的主要载体是古代的书籍、绘画、书法等有形的物质媒介,其次是非物质的、口头的、现代还流传的各种技艺。

大学学科分类固然要以知识分类的逻辑为基础,但出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即“以治道为中心”),有些新兴学科可以在交叉学科的门类下设立,为人类解决自身的问题提供一种带有较强综合性的方案与思路。

基于知识分类逻辑的学科分类,从原则上划定了该学科的课程体系边界及其主要内容。但是课程体系又不完全依照学科分类来展开。这与大学教育的自身功能密切相关。大学教育一方面是通才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知识教育,另一方面是成人的教育,即以人格的养成作为自己的任务之一。让人成为某一方面的专业人才,是大学成人教育的基本要求。大学里的人格教育与养成,则是大学成人教育的高端要求或曰根本要求。当代中国要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要培养热爱中华民族,同时又有世界主义情怀的高端人才,这是我们成人教育的本质要求。课程体系中那些逸出学科分类要求的部分,

^① 参见《前言》,[英]迈克尔·波兰尼著、许泽民译《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页;张一兵《代译序》,[英]迈克尔·波兰尼著、王靖华译《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既是成人教育的需要,还有突破学科边界,培养人的全面认知能力与适应社会变化能力的需要。学科分类与课程体系之间的区别可以简化为如下四点原则:

第一,学科分类是课程体系设置的出发点。这是大学知识教育的基础,也体现了求真精神。课程体系必须依赖对于学科内部结构的认知。

第二,课程体系有逸出学科体系的一些内容,这是大学教育中相对于成才教育而言的成人教育的根本要求。如国学学科仍然要教授现代科学、现代西方哲学、文化一类的基本课程,尤其是要教授一些与现代国家、民族的精神相关的课程。这些知识内容并不是国学一级学科的知识与学问。

第三,相同的学科,在不同的学校可以有不同的课程体系。其基本内容可以是相通的,但是其辅助性的课程,不同院校的侧重点可以是不同的。因此,课程体系可以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具体来说,综合性大学的国学学科的课程可能偏重于基本经典的教育与研究,而一些专科性质的国学院系,可以更多地偏重于具体的技艺,如中医学院偏重于与中医相关的国学经典,艺术学院偏重于与艺术相关的国学经典。在中医类型的学校里,实际也可以开设一些国艺,如中国音乐、中国绘画与书法等课程,以培养中医类医生的个人修养,甚至可以通过这些艺术去治疗一些心理与精神性的疾病。

第四,具体到“国学”学科而言,不同的学校可以在分享核心课程的前提下,设置不同的课程体系。具体说来,基本的经典教育,经、史、子、集、中国宗教五类重要经典的研读,是所有国学学科要设置的基本核心课程。其他内容的教育则取决于不同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的传统、现有的师资力量等现实情况而有所取舍。

要而言之,在现代大学的教育体系与学科分类的体系里,在交叉学科的分类逻辑之下,我们可以尝试安排国学学科,使之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并能授予国学一级学科的学位,以便于正式、大规模展开国学教育。这对于重建中国民族的文化自信,增强民族的共识与认同感,将大有裨益。就世界文化类型的多元性而言,恢复“国学”亦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即能为世界提供中国特有的学问或知识体系,以拓展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至于作为一级学科的“国学”,是放在历史学门类,还是放在哲学门类,暂时可以不予讨论。“国学”可以像哲学学科那样,既是一级学科,又是学科门类。这些都只是次一级的的问题,暂时予以搁置。

【责任编辑:杨海文;责任校对:杨海文,赵洪艳】